

中华学人丛书



变局与抉择

晚清人物研究

◎ 李细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变局与抉择

晚清人物研究

◎ 李细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李细珠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2395-4

I. ①变… II. ①李… III. ①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2601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BIANJU YU JUEZE: WANQING RENWU YANJI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8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谭徐锋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前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无论是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虽然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历史的主体都是人。事实上，英雄人物也好，人民群众也好，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因而对历史也就有不同的贡献。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合力创造了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人是联结和主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灵魂。没有人，历史只是混沌洪荒；有了人，历史方才异彩纷呈。

历史研究离不开人物研究，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是以人物研究为主题。人物研究不能孤立地就人论人，而要考察人物生存的背景与时代，尤其要考察人物的生活经历，尽可能与所研究的人物对话，这样才能理解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所谓知人论世，亦即知世论人也。如陈寅恪先生所谓“应具瞭解之同情”，有云：“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谓真瞭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

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寅恪先生此处虽是就古代哲学史研究而论，其实历史人物研究亦不妨效法。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研究者设身处地，穿越时空，进入所研究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从人物论时代，从时代论人物，人生境遇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浑然天成，历史人物研究自可更进一境。

话虽如此说，但要做好历史人物研究其实很不容易。我个人觉得，历史人物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确定性，所谓“盖棺难以论定”。这不是一个简单定性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交往关系、思想源流、内心精神世界等具体史实的描述与解释，以及对其功过是非的整体把握问题。论者或谓不然，君不见历史人物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人物，怎能说不确定呢？事实上，历史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单面相的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难免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便为准确认识历史人物的真相增加了种种障碍。

具体而言，历史人物研究的不确定性，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时代变迁的制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物研究也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路径，在革命史视角下，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中的革命派人物曾经被无限拔高，革命的对立面人物则被任意贬低，处于两者之间“灰色地带”的人物则被有意无意地漠视而边缘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近代化视角的引入，开始拨乱反正，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洪秀全与曾国藩在历史研究中的命运，可谓天翻地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洪秀全与曾国藩当然是确定的，但后人对他们的研究与认识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只不过是一个显例而已。任何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达到或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最多只是反映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认识水平而已。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79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其二，是占有资料的有限。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历史人物研究也必须以史料说话。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推进，整理出版了大量晚清历史文献，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影印本《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李鸿章全集》《袁世凯全集》，等等，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历史人物研究。不仅如此，其他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也是空前的繁荣。总体而言，晚清历史人物研究可谓具有海量的史料，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历史人物，却又不会有现成的全部资料，所谓竭泽而渔只是理想而已。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研究者也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资料开展研究，因而也只能得到某些侧面的认识，而难以把握全体，只能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发掘而不断改进与完善。

其三，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个体认知的差异。尽管历史人物都是曾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不会自己呈现出来，而必须通过研究者主观认知的途径才能有所呈现。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既要利用既存史料，又深受其个人知识结构、所持立场方法及其所处时代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自不免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同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同一时代的研究者看法也不尽相同。历史人物研究中聚讼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甚至如盲人摸象般仅得一孔之见都不足为怪。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不可知论，而只是表明任何历史人物研究都只是阶段性的有限认识，人物研究永远在路上。比如说，孙中山研究长期以来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显学”，国内外学界有成百上千学者涉足其中，孙中山研究论著成千上万种，但迄今还没有一部被学界普遍公认的《孙中山传》，可为典型的例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人物研究中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或许正是其研究的魅力所在。

本书收录晚清历史人物研究10篇论文，是笔者关于倭仁与张之洞两项专题研究之外的人物散论。晚清时期，传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何去何从，国人如何自处，便成为时人思考的沉重话题

与必须面对的难题。观望、彷徨、呐喊、奋起、顿挫、再兴……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近代化在经世、洋务、维新、新政与革命的交互递进中艰难前行。本书涉及晚清士子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官僚曾国藩、倭仁、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张人骏、袁世凯及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近代初期他们面对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挑战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的心路历程，以及从洋务自强到变法新政时期清廷高层与地方大员面对千古变局的回应。这些论文虽然并没有使晚清人物应对变局的论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却从不同的角度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大变局中各类人物不同抉择的复杂面相。

目 录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

——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1
一、管庭芬行迹与“近代”边缘的海宁	2
二、科举的理想及其幻灭	5
三、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	15
四、战乱时期的经历与见闻	33
五、对近代西方的模糊感知	40
六、余论	46

人生境遇与时代变迁

——魏源、容闳、谭嗣同三题	48
一、略论魏源思想的文化背景	48
二、“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	57
三、谭嗣同戊戌进京前后的思想变动及其原因	67

曾国藩与倭仁关系论略

一、早年相交于师友之间	82
二、晚清理学两个路向	83
三、朝内朝外共辅“同治中兴”	88
四、晚年“绝交”说史实辨误	93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

——以 19 世纪 70 年代为中心	95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95
二、中日“修好”与联日制西	99

三、从台、琉事件看日本的野心	106
四、开放朝鲜与以西制日防俄	114
五、余论：相关问题的讨论	122
略论刘铭传的台海防御观	130
一、台防与东南海防	131
二、台防与闽防	134
三、海防与陆防	136
四、结语	140
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	
——与孔祥吉先生商榷兼论清末文献中的“政府”概念	144
一、几点商榷	144
二、“政府”与“成立新政府”之真义	170
三、余话	174
在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之间	
——从张之洞禁烟思想与实践的内在矛盾看晚清禁烟问题的 两难困境	177
一、张之洞对鸦片烟毒的认识及其禁烟思想	178
二、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的禁烟举措与成效	180
三、张之洞禁烟思想与实践的内在矛盾及其成因	184
四、晚清禁烟问题的两难困境及其失败症结	187
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	190
一、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	191
二、江苏谘议局的开办与张人骏	200
三、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的权限之争	208
袁世凯与清末责任内阁制	223
一、袁世凯与责任内阁制的提出	223
二、清廷高层政争与责任内阁制的流产	227
三、光宣间政争与袁世凯阁制主张再度受挫	237
四、袁世凯内阁与清王朝覆灭	245

神妖之间的人

——慈禧太后形象三面观	258
一、神化的慈禧太后	258
二、妖魔化的慈禧太后	271
三、还原到人的慈禧太后	285
后 记	301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

——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被学界大体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基本含义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此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在这个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经常被论者论及的有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梁廷枏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他们又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可为此提供一个典型的个案。学界既往关于管庭芬的研究比较欠缺,只是对其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成就有所涉猎^①,并在相关学人研究中稍有提及^②。随着管庭芬日记的刊布,管庭芬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③。本文主要利用新刊《管庭芬日记》等资料,具体探讨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以期为鸦片战争前后近代转型期传统乡村士绅的生活状况勾勒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

① 刘尚恒:《清管庭芬稿本〈一瓠笔存〉等三种叙录》,载《文献》1991年第3期;徐永明:《管庭芬未曾重订〈曲海总目〉》,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② 邵胜定:《〈曝书杂记〉的性质与钱泰吉的学术》,载《广东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3期;葛金根:《奇僧六舟》,载《东方博物》2008年第2期;陈鸿森:《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载《中国文化》2013年第2期。

③ 徐志平:《管庭芬〈淳溪日记〉》《管庭芬日记中的科举考试》,载《南湖晚报》2014年3月16日、5月18日。

一、管庭芬行迹与“近代”边缘的海宁

管庭芬，原名怀许，字培兰、子佩，号芷湘，晚号笠翁、芷翁、淳溪老渔、淳溪病叟、芷湘居士等，嘉庆二年（1797年）生于浙江海宁路仲里，诸生出身，能诗善画，精鉴赏，尤熟谙乡邦文献，勤于校勘，“生平露钞星纂，日以书卷为生活”，^①为清代浙江著名的民间藏书家和校勘学家，光绪六年（1880年）卒于乡里，享年84岁。

管庭芬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长达50余年的日记至今存世并被刊布。中华书局在选刊《淳溪日记》专题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部刊布系统整理过的《管庭芬日记》，^②为研究管庭芬及其时代的乡村士绅与地方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管庭芬自称其日记始于乙亥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年），此前18年的事迹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做了概要的追记；而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17—1819年）的日记因故被毁，也同样做了简要补记；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九月十二日至年底日记缺失，无从补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后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全部日记几乎无日缺漏地被保存并刊布于世。^③如此长时间且完整的日记，在清代与近代人物中都非常罕见，因而弥足珍贵。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刊《管庭芬日记》最后一天是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一年终了，戛然而止，也没有特别说明。此后15年——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1866—1880年），管庭芬是否还有日记，其实非常值得期待有进一步的新发现。当然，此为可遇而不可求，现在只能根据已刊日记考察管庭芬此前近70年（1797—1865年）的生命历程了。

① 许传需等原纂、朱锡恩续纂：《海宁州志稿》卷二十九，人物志，文苑，管庭芬，46页，1922年排印本。

② 管庭芬等撰、虞坤林整理：《淳溪日记（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3；张廷银整理：《管庭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③ 管庭芬非常重视写日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四年（1820—1865年）几乎无日间断，甚至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初二至二十九日病重期间由长子升恒代记近一个月（《管庭芬日记》第3册，1364～1366页）。

管庭芬一生最主要的生活空间是以路仲里为中心的海宁。根据新刊《管庭芬日记》，未见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前管庭芬离开海宁的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管庭芬第一次参加府试、院试，两次到杭州；入学后，又因多次参加岁试、科试、乡试等各种科举考试临时进省城，并与方外友人六舟上人等交往密切而在杭州南屏、天竺山等处短期住留。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管庭芬开始设馆授徒，“馆于晏城沈氏，离家仅四里，已入桐乡县境矣”^①。这次越境开馆属例外，其实管庭芬此后主要在家授徒，或设馆于郭溪鄞墅镇王家与郭家等处，并长期在硖石蒋氏别下斋校勘古籍，主要活动在海宁境内。

道光三年(1823年)、五年(1825年)，管庭芬曾两次到嘉兴走亲访友。道光九年(1829年)九月初二至十一日，管庭芬与友人柳湖“作越中之游”，^②到过萧山县。这是有据可查的几次短暂的出县境的活动。

管庭芬外游最远、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所谓“都门之游”。^③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二十一日，管庭芬辞别老母弱妻幼子，走出家门，沿京杭大运河北上，途经嘉兴、苏州、常州府武进县、丹阳县、京口(镇江)、扬州、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府山阳县、清江浦、宿迁、峰县、滕县、兖州府磁阳县、东平州、茌平县、高唐州、德州、东光县、沧州、静海县、天津关，于十月二十四日抵达通州漕县，投奔时任通州州判的堂兄管蓼吟(嗣许)，寄宿其官署之中。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初一至初六日、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管庭芬两次短暂到京师活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管庭芬告别兄嫂，离开漕县第三次进京，十二月初四日离京南归，基本上按照原路，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二十五日返回海宁家中。此次北上进京远游，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还有一次在海宁县与杭州府境外远游，是管庭芬与好友六舟上人的“越东之游”。^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十五日，管庭芬与六

① 《管庭芬日记》第1册，66页。

② 《管庭芬日记》第2册，533页。

③ 《管庭芬日记》第2册，589页。

④ 《管庭芬日记》第3册，1344页。

舟上人从杭州南屏出发，途经萧山、上虞、姚江等县，十八日到达宁波府城，十二月初四日从宁波按原路返回，途中受友人之邀，特游兰亭，过绍兴府城，十二日回到杭州南屏。

除了多次到省城杭州及京师、宁波两次远游之外，管庭芬主要生活在海宁。海宁位于浙江省北部，东邻海盐，西接余杭，北连桐乡，南濒钱塘江。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海宁由县升州，隶属于杭州府。海宁又名海昌，是浙江省城杭州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海宁州志》称：“海昌西联省会，东接大洋，其地政繁而赋重，矧海塘系七郡之安危。……升县为州，奉旨准行，盖实为全省之望焉。”^①

管庭芬的家乡路仲里，是海宁县城东北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落。“路仲里，一名淳溪，在县城东北三十里，稍北三里为桐邑界，西北四五里为崇德界。地居偏僻，小有市廛。东西广里许，南北相去甚促。士民环市而居。”^②路仲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淳溪贯穿南北，水道纵横交错。从路仲里外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在《管庭芬日记》中，随处可见“舟之……（某处）”的记载，如《海宁州志》所谓“行者工舟楫”^③，正是对海宁交通状况的如实写照。从海宁到杭州的交通，也主要是水路。《海宁州志》载：“自省至县，水路三：曰上河，由临平镇；曰下河，由塘栖镇，俱会于长安镇；曰备水塘河，由打铁关。陆路一，曰南塘，出省城太平门，由海塘，抵县南门。水路上河一百二十里，下河一百四十里，备水塘河一百里，陆路一百里。”^④管庭芬从海宁到杭州经常走的是长安至临平一线的上河水路。应该说，海宁的对外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

但是，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一样，海宁走向“近代”的步履也是非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广州、厦门、福州、

① 战鲁村修：《海宁州志》卷一，州治，14页，乾隆四十年（1775年）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重刊本。

② 许传需等原纂、朱锡恩续纂：《海宁州志稿》卷三，舆地志13，市镇，4页。

③ 战鲁村修：《海宁州志》卷二，风俗，49页。

④ 战鲁村修：《海宁州志》卷一，疆界，12页。

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天朝上国”的封闭体系被打开几个缺口，但整个清王朝仍然基本上沉浸在昏睡状态之中，甚至期望从南京“城下之盟”得到一种永久的和平。“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①鸦片战争之后 20 余年，中国丧失了第一次近代化发展的机遇。虽然五口通商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之下被迫走向近代世界的窗口，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从这些窗口呼吸到域外新鲜的空气，通商五口的近代化也没有迅速向内地辐射。与内地其他地方一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海宁也没有随之走向近代化，而最多只是处于“近代”的边缘。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空间的边缘。海宁介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与宁波之间，按照当时海宁至上海、宁波的交通条件，其实不难受到上海、宁波近代化辐射的波及，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 年 11 月 17 日）开埠，宁波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44 年 1 月 1 日）开埠。当上海与宁波被迫接受近代西方事物开始近代化历程时，海宁仍在传统中国体系内自我蜕变。其二是实质意义的边缘。如果把中国早期近代化理解为与近代西方的接触、认识与适应，那么在《管庭芬日记》中就根本看不到“近代”的因素，通过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夷”入侵以及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传闻，管庭芬对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详下文）。管庭芬在海宁与杭州的生活很难说有“近代”的因素，即使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到过开埠后的宁波，似乎也没有“近代”的感觉，最多只能说生活在“近代”的边缘。

二、科举的理想及其幻灭

尽管人们对科举制度时有非议，但科举考试对于传统士人却有着无穷的魅力。曾国藩常以入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为耻，左宗棠则终身以仅得举人为憾，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儒林趣谈。显然，对于传统士人来说，科举功名具有与身家性命等同的价值。“本朝最重科目，咸同

^① 曾国藩：《稟祖父母》，见《曾国藩全集·家书》第 1 册，33 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①可以说，科举功名是传统士人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生当嘉道咸同的管庭芬，自然不能免俗。

管庭芬4岁开始识字，从父亲读《千字文》等书，随后在父亲与塾师金介亭指导下学习四书五经。16岁课时艺并“观场州试”^②，此后从金介亭专课举业。

与一般传统士子一样，管庭芬非常憧憬学而优则仕，“他年若许登台阁，愿作朱云折栏旌”^③，但其科举道路一开始便不平坦。嘉庆二十年(1815年)，19岁的管庭芬第一次正式应试，虽顺利通过州试、府试，但院试不幸落榜。其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17—1819年)的日记因故被毁，但在日后简要补记中并没有应试记录，似有不堪回首之隐衷。在补记中，他自叹“学业无成”，有谓：

余马齿渐长，学业无成，惆怅之余，作诗聊以自励。云：“土木形骸了不知，赖趋庭训与严师。敢抛笔砚将身误，要卜文章报国时。白日易荒须努力，青年不再莫荒嬉。蹉跎究竟思无益，须念高堂发尽丝。”聊写真意，非因吟咏也。^④

甚至有对科名的鄙薄，日记有谓：

读书所以长识见，若徒博科名，死于章句下，不知古今理乱为何物，亦属可怜。余有绝句云：“静摊黄卷对孤檠，一榻丛残手自评。别有深心人不解，读书岂仅博科名。”^⑤

又有对族人澹凝茂才“颇有击碎唾壶之慨”的下第诗的共鸣，“依韵以和，并为寄慰”，有云：

① 胡思敬：《科目盛衰》，见《国闻备乘》，4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② 《管庭芬日记》第1册，13页。

③ 《管庭芬日记》第1册，66页。

④ 《管庭芬日记》第1册，70页。

⑤ 《管庭芬日记》第1册，72页。

其一：“寒毡枯坐对空园，老屋三间寄隐身。鲤跃禹门先点额，珠投暗室便韬真。不随世上撞竿戏，懒逐天涯马足尘。今日何须歌伏枥，英雄岂仅作遗薪。”其二：“虽非潘岳旧丰神，笔阵能攻百二秦。大器由来成晚节，好花从不放三春。胸添闷垒宜浇酒，室有奇书可贺贫。从此鹏骞原指日，岂嫌华发渐成银。”^①

可见这三年似也有应试落第的经历。既郁闷又倖存期望，管庭芬的心情无比复杂。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4岁的管庭芬终于如愿考入海宁州学为生员(秀才)，取得最低一级的科举功名，成为下层士绅。友人金秀峰赠诗曰：“雅慕君才抵甲兵，果然一举便登瀛。文因博览增奇气，诗以清言获盛名。此日鹏程初发轫，他年凤阁即蜚声。从知云路原非远，有志何难事竟成。”^②管庭芬记下此诗，心中充满憧憬。

第二年，正值道光元年(1821年)辛巳恩科乡试，管庭芬乘胜出击，但遗憾的是这第一次又应试不中。其落卷评语为：“少精警刻露之笔。”^③管庭芬无话可说，然初战不利，总不免失意之感。其咏秋海棠诗有曰：“也随黄菊艳墙东，绰约娇躯倚碧桐。滴泪竟成千古恨，断肠偏放一秋红。醉痕上脸难禁雨，病迟梳头懒避风。十二阑干重点缀，美人原在梦魂中。”虽自云“聊以咏物而已，若曰有托，则吾岂敢”^④，但实在难掩内心失落之伤。

不知何故，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乡试，管庭芬并没有应试。其当年《岁末感怀诗》之四有云：“韶光一掷疾如梭，总忆春回腊又过。淅沥寒声销病骨，寂寥灯影动帘波。无才敢望青纱脱，有志当须铁砚磨。收拾残书作归计，何年方听鹿鸣歌。”^⑤仍对科举充满殷切期望，而且有立志苦读势必拿下之意。

为全力以赴参加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乡试，管庭芬甚至毅然

① 《管庭芬日记》第1册，83页。

② 《管庭芬日记》第1册，99页。

③ 《管庭芬日记》第1册，152页。

④ 《管庭芬日记》第1册，151页。

⑤ 《管庭芬日记》第1册，197页。